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 · 管理类

# 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 制度性因素研究

——基于企业、市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Enterprise, Market and Country

刘航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管理类

# 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 制度性因素研究

——基于企业、市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Enterprise, Market and Country

刘 航/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制度性因素研究——基于企业、市场、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  
刘航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6

ISBN 978-7-5096-5081-3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制造工业—研究—中国 IV. ①F4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3044 号

组稿编辑：杨国强

责任编辑：杨国强 张瑞军

责任印制：黄章平

责任校对：超 凡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www.E-mp.com.cn](http://www.E-mp.com.cn)

电 话：(010) 51915602

印 刷：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1000mm/16

印 张：14.25

字 数：208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6-5081-3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 68022974 邮编：100836

## 前 言

目前，国际和国内研究者都关注到了更广泛的比较优势来源，其中合理的制度安排是一种优质的无形要素，制度的动态调整发展成为各国贸易增长和比较优势提升的重要来源。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发展转型的战略机遇期，面临着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压力，亟须以制度变革为突破口而促进各种要素的均衡增长与结构优化，并形成以最优方式持续提供制度变量的新的比较优势提升机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现有观点，理性的市场主体致力于维持现有产权并追求剩余权利，而好的制度应保护其对剩余权利的合理追求，规制不合理追求。企业是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制造业企业在内外部制度环境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投入中间品、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并由此获得收益。制度变量应分别从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国家层面影响企业对中间品、生产要素和公共产品的投入，包括投入的规模、结构与方式。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制度的提供者分别为上下游企业、要素市场和国家公共政策，而各种制度下的最终决策者和受益主体仍是企业。各种层面的制度通过对广义交易成本的影响，作用于企业的生产效率及其出口意愿和能力。一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升应建立在最大化节约广义交易成本的基础上，因此，制度对制造业比较优势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进行了文献回顾并构建了全书理论框架之后，本书重点

对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影响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机制及实效分别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进而结合中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现实背景，综合研究如何通过制度安排的调整变革实现外贸要素结构、市场分布和贸易方式以及开放型经济收益分配格局的转变。

在第四章中，本书研究了企业层面的制度对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本部分分别构建了两种范式的理论模型分析市场要素和组织要素的充裕度与密集度对制造业出口优势的影响，得出了“一国在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理论命题，并利用中国的地区—行业交叉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制造业出口优势受市场要素的影响为正，受组织要素的影响为负。

在第五章中，本书研究了市场层面的制度对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本部分构建了一个“ $2 \times 2 \times 2$ ”模型分析要素价格扭曲及其纠正措施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得出了“一国规制要素价格扭曲的制度对比较优势的成效会随着扭曲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理论命题，并利用中国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致力于纠正资本价格扭曲的金融市场化和致力于纠正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劳动者保护作为制度变量，越是充裕，越不利于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提高，且扭曲程度的加深会加剧这种负向作用。

在第六章中，本书研究了国家层面的制度对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本部分构建了一个中央—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得出了“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和基础税源的扩大有助于贸易利益和比较优势的长远发展，而垄断和腐败会对冲这种促进作用”的理论命题，并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垄断和腐

败会阻碍财政分权对比较优势的正向作用，加剧地方竞争对比较优势的负向作用。

在第七章中，本书结合中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现实背景，综合分析了每章结论的政策含义，探究了如何调整和改进企业层面、市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制度，使其发挥出对外贸收益和比较优势的长远促进作用。最后给出了全书的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目 录

<b>第一章 绪论 .....</b>	<b>1</b>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1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4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8
第四节 创新点和不足 .....	13
<b>第二章 相关文献评述 .....</b>	<b>17</b>
第一节 比较优势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17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延伸 .....	26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发展转型的研究 .....	34
第四节 总体评价 .....	39
<b>第三章 理论框架 .....</b>	<b>41</b>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41
第二节 一般逻辑规则 .....	49
第三节 总体框架体系 .....	50

<b>第四章 企业层面的制度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b>	55
第一节 引言 .....	55
第二节 理论分析 .....	59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67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80
<b>第五章 市场层面的制度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b>	85
第一节 引言 .....	85
第二节 理论分析 .....	92
第三节 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测度 .....	99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10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117
<b>第六章 国家层面的制度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b>	121
第一节 引言 .....	121
第二节 理论分析 .....	127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14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154
<b>第七章 基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政策含义 .....</b>	159
第一节 对转变外贸要素结构的启示 .....	159
第二节 对转变外贸市场分布的启示 .....	163
第三节 对转变贸易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启示 .....	167
第四节 对转变开放型经济收益分配格局的启示 .....	170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175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175
第二节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178
附 录 .....	181
参考文献 .....	191

# | 第一章 |

## 绪 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目前，如何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创新，探究国际贸易和各国产业发展的最新表现及规律，成为理论界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如李国平等（2004）提出了附加环境因素的比较优势理论，包群等（2008）关注到了金融发展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然而，大多数文献仍将比较优势置于 H-O 理论的基本框架中，把优势来源抽象为资本和劳动要素。即便是“动态比较优势”概念下，优势来源主要是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产业布局等，归根结底仍是同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流动和配置相联系（韩民春等，2009）。企业间异质性使其工资—租金率的比值倾向于随企业规模、所处行业或地域等而发生变动，从而如果仅以资本和劳动作为比较优势来源，则一国内的企业间或行业间要素密集度逆转（Factor Intensity Reversals）难以避免。尽管国外研究者很早就通过特定要素模型（RV 模型）克服这一缺陷（Samuelson, 1971；Schweinberger, 1980），但仍未跳出资本—劳动的既有框架，对当今世界制造业分工与贸易格局的解释力不够。

企业间或行业间出现要素密集度逆转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非完全自由流动。一些研究将制度性安排视为无形产品，其表现出非竞争性、消费的非均质性和非排他性，甚至有的文献明确指出制度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刘锡田，2005），“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李森等，2007）。而制度设计和提供毕竟是需要成本的，并且制度的非排他性是不完全充分的，容易由于过度消费而导致“拥挤效应”。按照陈其林等（2010）的划分，制度更接近于经营型准公共产品。如果将制度性因素作为比较优势来源，则无论其属于何种产品，都能够较好地避免出现要素密集度逆转。可见，将制度性因素作为一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来源，从制度的各个层面探讨其对该国或地区比较优势的影响是必要的。

始于科斯（Coase, 1937）的新制度经济学已经将制度性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做了细致的研究。柯兰德（2005）将制度分析方法分为三种：一是科斯、诺思等的交易成本方法；二是布坎南、托利森和塔洛克等的寻租方法；三是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方法。有的研究者还提出了三种方法的综合路径（卢现祥，2011）。这些方法均能够通过创新而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Williamson（1985）、Grossman 等（1986）及 Hart 等（1990）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GHM 模型，提出了“合约实施效率”这一重要概念，后来的研究者将该概念引入对比较优势的分析中，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 Berkowitz 等（2006）、Nunn（2007）等为代表的“专用性资产投资”观点；二是以 Acemoglu 等（2007）为代表的“分工深化”及“技术选择”观点。可见，新制度经济学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融合，给本书的选题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背景和研究基础。将制度作为比较优势来源引入对国际贸易的分析中，具有一定可行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其中制造业出口增长的贡献尤为突出。一些学者从比较优势理论的视角对其做出了解释，认为中国在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中选择了前者，发展了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林毅夫等，1999, 2006, 2008）。同时，还存在与之相左的观点，认为比较优势战略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固化效应，阻碍技术进步，并使产业对外部冲击更加敏感。他们还认为比较优势战略论者较少考虑到中国经济以转轨为特征的诸多制度性因素，比如非市场因素大量存在，市场主体违约现象普遍（黄志启等，2010；贾康等，2010；伍业君等，2012）。尤其在当前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劳动力优势相对减弱的背景下，严格按照传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模式遭到了更加广泛的批评，而在制度创新中寻求新的比较优势，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孙杰，1997；刘航等，2011；杨青龙，2012）。

从微观看，近年来在国内成本攀升和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下滑的双重压力下，我国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意愿明显增强，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进入2012年，欧盟经济陷入低迷，欧美再工业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改变着全球产业格局，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震荡（白永秀等，2012）。受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共同影响，我国工业品出口增速明显回落，不少外贸企业再度陷入经营困境，对一些出口导向型产业集聚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造成较大冲击。从宏观看，随着综合成本上升以及汇率变动，以“制造成本”优势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比较优势进一步弱化，一些行业和地区出口优势衰减的态势很难逆转。面对严峻的外贸形势，迫切需要在巩固传统优势基础上，着力打造新的竞争优势。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2009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2012年2月，十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指导意见》。而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最首要的便是改变“对有形要素投入依赖程度高，对无形要素投入依赖程度低”的现状（钟山，2010）。总之，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构成了本选题的实践背景。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我国在进一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进程中，必须充分挖掘并发挥制度性因素的潜力。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主要分析三方面的基本内容：贸易基础、贸易模式和贸易所得（贾明德等，2004）。按照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或相对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各国出口自身优势产品、进口自身劣势产品，最终都获得总消费水平的提高。按照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要素（资本和劳动）的充裕度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各国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资源所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后来，研究者放宽了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严格假设，提出了技术进步、知识扩散和溢出、不均质劳动力等重要假设，从而创立了贸易新要素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论断。进而，在产业内贸易兴起的背景下，研究者将偏好相似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引入这一现象的分析中。这些理论基本上是将技术、资源禀赋、分工协作等看做国际贸易的原因，而未

涉及导致这些国际差异背后的各国制度差别，从而在他们对贸易模式和贸易所得的分析中，也是以商品生产价格（成本）作为分析变量，缺乏与商品生产所依托的宏观和微观制度环境之间的联系。杨小凯等（2000）创立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运用超边际分析论证了贸易内生于专业化分工和市场一体化，他们看到了折中专业化经济与节省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使用制度解释生产和贸易的范式更加迈进了一步。但是，他们同之前的研究一样，并未着重探讨各区间不同的制度供给和企业对制度的利用能力的差异对贸易原因、格局和结果的影响。尽管 21 世纪以来，Grossman 等（2004）、Berkowitz 等（2006）、Nunn（2007）、Antras 等（2009）及茹玉骢（2009）所提出的契约的不完全性能够影响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的理论判断，使对问题的研究更加接近现实，但他们仅是沿着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语境定义制度的，将制度限定于对契约的事前或事后保障措施。

目前，制度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不再是简单地以所有制结构、宏观经济政策等描述了，而是已经渗透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每一项决策中，不同的制度变量会导致市场主体在联合或分立、自由贸易或产业保护、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等方面采取不同的态度。诸多市场主体态度的集合会产生不同的决策均衡，对于一国的对外贸易和世界贸易格局的演变会造成重要影响。制度也不能简单地被评价为好或坏，而应参照本国的产业发展对制度供给的需求状况和利用能力进行阐述。本书将制度性因素进行细分，采取统分结合的方法探究不同的制度变量对我国对外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从而把制度性因素作为一种要素禀赋纳入贸易模型，解决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的外生化缺陷，也为内生贸易理论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找到了更加直观的论证。同时，把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引入国际贸易分析的

现有文献加以拓展和系统化，是对现有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一种尝试性创新，也弥补了国内就此问题研究的一些空白，丰富了相关文献。

## 二、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表明，后起飞国家在走过早期的低成本出口增长阶段之后，需要重新认识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调整对外经济贸易结构，开发和培育出口产业新优势，即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商务部研究院课题组，2012）。加入WTO以来，我国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与主要贸易伙伴摩擦加剧、大宗商品进口价格攀升等问题日益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宏观经济的协调和稳定。为实现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措施，以“调结构”、“促平衡”、“转方式”为方向进行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然而，随着近几年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劳动力优势的“蝶化”（杨继军等，2012），以及欧债危机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等因素使世界经济环境更加趋向复杂甚至恶化，我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任务更加艰巨，外贸战略与政策调整需要兼顾多重目标和任务。而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首要含义是转变国民收益分配方式和格局（裴长洪等，2011），即实现包容性增长，既不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不可盲目进行产业升级甚至出现高水平重复建设。因此，单纯地就要素转换来谈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而是应寻求新的要素来源，也就是引入制度变量来改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均衡结果，从而提高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可持续性。制度本身是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和保障（钟山，2010；商务部研究院课题组，2012；张莉，

2012)，同时制度创新也应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优势来源之一。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能够影响经济中的私人产权及其衍生物——剩余索取权（控制权）、经济租等的界定分配过程和结果，而不同的产业对于制度供给的需求弹性和利用能力有所差异，制度的变动会引起贸易结构和竞争力的变动，因此制度创新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制造业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部门。“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达 60596 亿美元，占同期货物出口总额的 94.7%，工业制成品顺差额累计达 22937 亿美元，是同期累计总顺差额的 2.05 倍，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 2272 亿美元，占全部行业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 53.3%。2011~2012 年，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巴曙松，2012），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考虑将产业转移的重点转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林火灿，2012）。根据《中经产业景气指数报告》显示，2011 年第三季度至 2012 年第四季度，家电、钢铁、装备制造等多数制造业行业的景气指数均处于下行区间，产业预警指数均基本位于偏冷范围内。可见，我国制造业进入了一个发展转型的关键期，亟待引入新的优势来源——制度性因素，通过加大制度供给、优化制度结构、强调制度创新实现制造业的产品升级、合理集聚和可持续发展，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和贸易得利。本书将制度通过影响产权及其衍生物对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产生影响的动力、过程和结果作为研究对象，进而探讨如何优化制度安排、改善制度环境，充分挖掘制度性因素的潜力并使之服务于我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 第三节

#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一、研究内容

结合本书的研究背景和目的，本书以制度如何在企业、市场和国家层面上影响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为主要研究内容，探究不同层面上的制度性因素对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机制和现状，并为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提供合理的对策。本书的各章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本书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和不足等，从而引出全书的分析。

第二章是相关文献评述，主要介绍和评价国内外运用比较优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对本书相关问题的现有研究文献，从而指明本研究的文献基础及可能创新的方向。

第三章是理论框架，主要说明本书对制度的本质和思想内核的理解，并且构建了一个制度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贸易比较优势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对本书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加以界定和辨析，如比较优势、制度、产权、交易成本和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等，回顾其理论渊源，并结合现有研究与实践发展，对其进行拓展和创新；另一方面，对这些核心概念之间逻辑关系进行描述，以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层面上的制度对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机制。

第四章是企业层面的制度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主要分析由于存在资产专用性，企业在面临由中间品买卖契约